

论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高永久 杨建超

[摘要]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已经由民族平等问题过渡为民族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展望世界民族关系的未来趋势,民族间的不平衡将继续主导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态势。同时,恐怖主义、跨国界民族、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国家的民族整合能力等都将对某一方面影响着世界民族关系的未来走势。

[关键词]民族关系;发展趋势;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2)12—002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社区民族工作研究”(10BMZ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永久(1964—),男,新疆奎屯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研究;杨建超(1988—),男,河南许昌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政治。甘肃 兰州 730020

趋势研究是世界民族领域的重点话题,民族学界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历来见仁见智。从何种角度来分析发展趋势?哪些趋势会表现得相对明朗?世界民族关系发展的大体框架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不可能存在单一答案。不妨综合考虑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遇的历史事件,以及国家的民族整合能力等,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民族间的不平衡将会继续主导世界民族关系发展的态势

在较长时间内,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平等问题,民族平等问题的焦点在于不同民族之间应不应该平等。民族解放运动在二战以后迅猛发展,新成立的政权几乎都承认本国公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从而结束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不平等现象。同时,美国民权运动通过非暴力抗议的形式争取包括黑人等在内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最终迫使政府消除了法律上的不平等条款。民权运动不仅发生于美国南方地区,它还逐步扩展到了美国全境;不仅争取到了黑人的权益,还为其他有色族裔,以及妇女争取到了权益;不仅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它的持续时间和后续影响要长得多^[1]。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已经

在法律上明确承认了本国公民的平等身份,法理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的民族平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尽管民族平等问题在思想观念等方面仍有体现,但是民族平等作为一种原则已经没有太大争议。至此,不同民族之间应不应该平等的问题得到解决,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随之发生变化。

20世纪中叶,尤其是二战结束至60年代末的大约20年时间内,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逐渐过渡为民族间的不平衡问题。民族间的不平衡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国际层面,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多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际层面的不平衡与三次科技革命紧密相关,从科技革命中获益较多的民族往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反之则相对较低。国内层面,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平衡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历史延续、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许多因素,一般来说,自身条件越优越、发展意愿越强、发展机遇越好的民族,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反之则相对较低。

之所以说民族间的不平衡构成了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基于两方面的认识。其一,民族间的不平衡属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没有任何两个民族可以实现完全平衡;其二,民族间的

平衡是观察、分析世界民族关系的基石,任何研究都需要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民族间的不平衡,还需要辨清它与民族内部的不平衡以及地区间不平衡的关系。民族间的不平衡与民族内部的不平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内部的不平衡,反之亦然。民族间的不平衡与地区间的不平衡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对于一些民族特别是原生形态民族而言,共同生活的地域是构成本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往往也反映出了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民族间的不平衡带有波动性特征,即不同民族之间的差距有可能缩小也有可能扩大。有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可以借助后发优势,逐步缩小与其他民族的差距;而另外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则有可能因为社会动荡、发展意愿不强等原因,扩大了与其他民族的差距。波动性并不意味着民族间的不平衡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要想改善民族间的不平衡,市场发育程度、科技进步水平、人才培养机制等因素都将起到关键作用。鉴于这些变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民族间的不平衡必将持续较长时间。如果说民族平等问题的焦点是不同民族之间应不应该平等,那么民族间不平衡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改善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作为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民族间的不平衡将会继续主导世界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态势。

二、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将会继续破坏民族关系的发展态势

21 世纪的最初 10 年,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国际格局的走势,以反恐为目的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事件都昭示着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的影响力。张家栋对恐怖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比较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表 1)。据他分析,第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带有明显的宗教动机,重视宣传但更重视杀伤,恐怖组织几乎与所有国家为敌,基地等大型组织主要起到宣传和示范作用,分支组织则呈现出小型化、当地化、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等特点。当前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分别以宗教复兴

和民族分离为主要目标。基地组织是典型的带有宗教对抗色彩的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与车臣有关的恐怖活动则以民族分离为主要目的。

表 1 四次恐怖主义浪潮比较

	动力来源	持续时间	标志性手段	主要目标
古代	宗教极端主义	不确定	暗杀、屠杀	官员、平民
第一次	无政府主义	30-40 年	暗杀	官员
第二次	反殖民主义	40 年	爆炸、屠杀	官员、平民
第三次	意识形态	30 年	劫机、绑架、暗杀	官员、平民
第四次	宗教极端主义	进行中	自杀式袭击	平民

资料来源:张家栋《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国际观察》2007 年第 6 期。

“9·11”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阿富汗战争,给阿拉伯人和欧美人,给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带来的消极影响难以估量。一方面,阿富汗等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持续高涨;另一方面,美国和欧洲针对阿拉伯移民的示威活动时有发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又加剧了阿拉伯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恐怖主义的消极作用远不止民族关系这一个方面,它还极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破坏宗教关系、引发社会动荡、阻滞经济发展、引起国际纠纷等,但是对民族关系的破坏始终是恐怖主义势力活动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给民族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毋庸置疑,“9·11”事件及其带来的冲击就是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对民族关系造成破坏的具体表现。

与宗教相关的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相比,以民族分离为目的的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给民族关系造成的破坏更为直接。车臣问题是苏联解体的遗留问题,若干年来,信仰伊斯兰教的车臣人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两次车臣战争以及频繁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数以万计的车臣人和俄罗斯人的伤亡,在两个民族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心里创伤。武装分子发动恐怖袭击事件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车臣从俄罗斯联邦分离出去,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穆斯林国家。在这类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中,民族关系与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宗教信仰等交叉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其中,破坏民族关系是这类恐怖主义势力活动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

无论上述哪一种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短时间内都无法根除,对民族关系的破坏作用也会持续下去。尽管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初就试图制订从阿富汗战场撤军的时间表,但是直到现在,阿富汗局势仍然错综复杂,尚未出现缓和迹象。阿富汗战争没有终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自然不会消失。事实上,鉴于伊斯兰世界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使阿富汗战争结束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恐怖袭击事件的减少。以民族分离为目的的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往往植根于两个民族之间的长期敌视,恐怖主义行为又反过来加深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这类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与民族关系之间的恶性循环平添了解决问题的难度。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将会继续破坏民族关系的发展。

三、跨国界民族问题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热点

跨国界民族是民族发展过程与国家发展过程中彼此交织产生的历史现象。一般来说,跨国界民族至少需要满足几个构成要素,即有些民族有基本固定且相互毗邻的聚居区域,并且聚居区域分布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2]。比较典型的跨国界民族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蒙古人、马来人、泰米尔人、巴斯克人、索马里人等。居住在朝鲜、韩国以及中国东北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可以被称为跨国界民族,而居住在中亚的朝鲜人虽然不与周边的同一民族相互毗邻,也可以被称为跨国界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分散在欧洲多国的吉普赛人虽然没有基本固定且相互毗邻的聚居区域,也属于跨国界民族。

跨国界民族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成为国际热点,但从20世纪末开始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冷战的结束让许多原本被隐蔽的民族问题开始显露,其中,许多民族问题都涉及到跨国界民族。最极端的例子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复苏,这两股势力不仅影响到了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而且严重威胁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复苏是跨国界民族问题的极端表现,并非所有的跨国界民族问题都会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

来。在多数情况下,跨国界民族问题主要包括移民问题、经济纠纷问题、走私问题、跨国刑事犯罪问题等。跨国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分裂势力的产生,只要妥善处理,跨国界民族问题也能够得到顺利解决。

促使跨国界民族问题成为国际热点的另一个因素是各国开放程度的扩大。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都加快了融入世界体系的步伐。尽管国家之间的联系还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领域,但在注重经贸联系的同时,国家之间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的联系也在逐年加强。跨国界民族以其特有的身份优势、地缘优势、语言优势,可以在国际交往中起到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跨国界民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跨国界民族问题的产生,只要合理引导,跨国界民族就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基于国际交往不断扩大的客观现实,跨国界民族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四、国际移民的数量和结构将会发生改变

从总体上说,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包括技术全球化、社会关系全球化、政治文化观念或价值观念全球化等三个不同的层面^[3]。从更加广义上讲,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也包括信息通讯的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全球化、社会制度的全球化、观念价值的全球化、社会风险的全球化以及人口、环境、能源问题的全球化。全球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多个层次,例如,有研究者在论证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时,主要关注了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问题^[4]。在全球化影响民族关系的多个层次中,全球化对国际移民的影响比较直接、比较明显,在世界范围内更具有普遍意义。

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移民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移民随着资本和就业市场的变化不断流动,并且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在国界相对模糊的欧盟和北美地区,移民形式更加多样,往返频率相对较高。以美国为例,截止到2009年,出生在国外的人口已经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大约占总人口5.5%的人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表2)。

另有数据表明,在出生于国外的美国人当中,大约53.1%的人出生在拉丁美洲,其中,墨西哥占到29.8%^[5]。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两国毗邻的原因,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有效遏制了美墨边界的非法移民和刑事犯罪,从长远来看,有助于促进墨西哥移民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美国。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致性来看,墨西哥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较高,恰恰反映出全球化对于国际移民的促进作用。

表2 美国人口的出生地和公民身份构成:2009年

名称	数量(千人)	误差(±,千人)	百分比(%)
总数	307007	(×)	100.0
国内出生	268489	116	87.5
国外出生	38517	116	12.5
美国公民	16846	68	5.5
非美国公民	21671	120	7.1

资料来源:U. 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09.

下载地址:美国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pop-acs.html。访问日期为2011年9月28日。

国际移民尤其是文化异质性较强的国际移民会给输入国带来许多现实问题。杰里米·里夫金在研究欧洲的移民困局时将这些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1)当结构性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移民将与欧洲人争夺本就不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机会;(2)移民以及移民教育将会占用宝贵的社会服务,令业已不堪重负的福利系统雪上加霜;(3)部分文化团体认为贫苦移民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6] P. 223}。欧洲的移民困局涉及到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公共安全三个方面,其实,这些问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只不过这些国家原本就由移民构成,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较强,因而上述问题不如欧洲那样明显。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以外,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国际移民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是发达国家还不得不继续吸收大批国际移民。究其原因,欧美等发达地区吸收外来移民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其国内劳动力的不足。特别是在出生率持续走低,老龄化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吸收年轻、廉价的外来劳动力成为欧美国家的首要选择。全球

化加剧了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要想保持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领先地位,发达国家就必须通过吸收国际移民来保持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稳定,何况外来移民在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农业等行业中的价格优势远胜于国内劳动力。据Richard Bernstein预测,从2003年至2050年的半个世纪中,将有大约5000万移民进入欧洲^[7]。与欧洲的情况类似,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发达国家对外来移民的需求量不会出现大幅回落,国际移民的数量将会持续增长。

国际移民持续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移民数量的增长。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逐渐增多,从而为移民的增长创造了条件。一般情况下,历史记忆较为密切的国家之间,国际移民的数量相对较多;文化相似性较强的国家之间,国际移民的数量相对较多;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国家之间,国际移民的数量相对较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移民目的地,国际移民的输出地和输入地更加多元。国际移民的指向不再像以往那样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移入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正在迅速增多。综上所述,国际移民的数量增长及其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多元化是一种趋势,全球化进程对这一趋势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五、民族关系的发生地将越来越多地向城市转移

从宏观上看,由乡村进入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之一,不论是较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属于普遍现象。如表3所示,截止到世纪之交,世界城市化率达到47.1%,换言之,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已经进入了城市。根据联合国的估测,到2030年,将有超过六成的世界人口完成城市化进程。1950年至2030年,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增长速度渐趋减缓;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增长速度进入21世纪之后也出现明显下降,由原来的年均1.63%降为年均1.14%。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总体趋势是:城市化率越来越高,城市化增长速度越来越慢。既然城市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趋势,那么它对未来的世界民族关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表3 世界城市化率与城市化速率:1950年至2030年

	城市化率(%)				城市化速率(%)		
	1950	1975	2000	2030	1950-1975	1975-2000	2000-2030
世界	29.1	37.3	47.1	60.8	0.99	0.93	0.85
较发达地区	52.5	67.2	73.9	81.7	0.99	0.38	0.33
欠发达地区	17.9	26.9	40.5	57.1	1.62	1.63	1.14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NY: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 2004, p. 5.

在多民族国家,城市化进程一般意味着若干民族的人口流动,而不是特指某一民族。来自不同民族的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势必改变城市的人口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带来的不仅是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民族身份属于人口结构的重要维度,在其他要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民族身份的异质性越强,城市中的民族关系就会越复杂。与此相对,城市化不仅意味着乡村人口规模的相对减少,也简化了乡村的人口结构。一旦某地的民族构成趋于简单,那么当地民族关系的复杂程度也会相应降低。人口流动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民族构成,而民族构成的变化又会反映在民族关系层面,从这个角度分析,城市化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关系的发生地。

城市化促使民族关系发生地向城市转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业缘关系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渗透。与乡村社会注重血缘关系不同,城市社会对业缘关系特别重视,而城市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无论是异地城市化还是本地城市化,乡村生活方式必然要逐渐向城市生活方式过渡。城市生活方式要求市民以职业交往为主要途径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从而大幅提高了民族交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族交往牵涉到不同的民族或不同民族身份的个人、家庭、组织等,是构成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而民族关系也通过民族交往具体实现与体现^[8]。从业缘关系、城市生活方式以及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城市化进程将会带来民族关系发生地的转移。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原因,城市化促使民族关系发生地向城市转移还包括其他原因。例如,城市化会带来居住格局的变化,增加民族混居的可能性,从而给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带来变化。无论哪一种原因,乡村民族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趋于简化,城市民族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趋于复杂,俨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一方面,民族关系发生

地的转移使城市民族关系越来越复杂,有可能增加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发生几率;另一方面,这种转移也为处理原有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机遇,很多原本棘手的问题可望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解决。城市化与民族关系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如何分析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利用好城市化这一机遇,不仅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也是保障城市化顺利进行的客观要求。

六、民族之间的交往机会和交往途径将会发生变化

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进程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尽管各个国家对信息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发展信息产业并且借助信息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信息化涉及到若干领域,包括企业管理信息化、政府管理信息化、消费方式信息化、社会生活信息化、国民经济信息化等。信息化不仅可以改变企业管理方式,而且能够提高信息传播效率、推动信息技术革新、促进信息资源共享,甚至能够改造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信息化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交通通讯领域,波及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立于信息化进程之外。在信息化背景下,及早预测信息化给社会领域带来的影响,并据此做出合理判断显得尤为重要。

在信息化进程中,信息传递不畅和信息传递失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问题有可能给民族关系造成不良影响。例如,发生于2005年的巴黎骚乱就与信息传递不畅和信息传递失真有关。事情的起因是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在躲避警察追捕的过程中触电身亡,超乎人们的预想,一起刑事案件最终引发大规模骚乱。在事件逐渐升级的过程中,政府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的有效沟通不足,各种流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类案例中,个体之间的摩擦通过失真的信息传递被过分夸大,进而升级为群体之间的矛盾,原本属于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上升为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信息传递不畅和传递失真在特定情况下会带来民族关系问题,并不表示信息化与民族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症结不在于信息化进程本身,恰恰在于信息化体系尚待完善。

在完善的信息化体系中,信息传递不畅和传

递失真问题将会得到及时纠正。从这个角度来看,信息化进程的总体进步性无可争议,信息化对于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信息化给民族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直接体现在民族交往过程中。信息化为民族成员创造了更多的交往机会。其一,信息化的发展通常表征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民族成员的就业更加多元,职业交流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其二,信息化还为很多人提供了从事信息产业的机会,与其他产业相比,信息产业对职业交往的要求更高。除此之外,信息化还给民族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包括计算机、手机在内的新兴科技扩展了民族交往的可选择途径,民族交往越来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七、国家内部的民族整合将会进一步加强

强化民族整合是许多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活动始终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如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中东的库尔德人问题、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等,无一例外地威胁着国家统一与地区稳定。发生在巴黎、伦敦的骚乱以及挪威的枪击事件,又体现出国际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异质性过强^[9](P. 487),或者民族结构的变动速度过快,都会增加民族整合的难度。民族分离问题往往就是民族异质性在特定环境中被激活的极端表现,国际移民问题则主要是民族结构变动速度过快造成的后果。民族异质性需要适度,民族结构的变动速度需要适中,过度的民族异质性和过快的变动速度都有可能制约国家的民族整合进程。

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民族整合的主要方面。周平认为,渐趋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族际整合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改进和完善民族整合模式需要建立民族意识调控机制,保持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相互协调^[10]。他所说的民族意识、国民意识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基本一致,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的相互协调,也可以理解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协调。除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政府认同也是政治整合的重要内容。民族成员可以认同自己的国家,并以身为本国公民而感到自豪;但他并不一定认同本国政府,并不认为政府能够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民族整合所要达到的目的,应当是在尊重多元民族文化

的前提下,提升各族成员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使其与民族认同协调一致。

提升国家的民族整合能力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手段之一,民族整合能力越强的国家,发生民族问题的可能性就会相对较低。当然,民族整合不仅需要国家政治能力的提升,更需要具备其他客观要素。在现阶段,这些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秩序可以为各国的民族整合提供必要的国际环境;世界主要国家越来越成熟的政治制度可以为民族整合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对于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而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为民族整合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且提升民族整合的合法性;对于美国、日本、西欧国家而言,相对较低且总体稳定的失业率水平能够为民族整合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提高民族整合所需的社会容忍度。如今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民族整合能力的提升,在具备了上述客观要素的基础上,各国的民族整合将会进一步加强。

预测世界民族关系的变化趋势,学术界不可能达成完全统一的认识,因为每一位研究者都有自己的认识标准和研究尺度。研究者在研究、判断变化趋势时不妨考虑以下四点建议:(1)可以结合世界民族关系所具有的主要特点进行研究,这些特点包括民族间的不平衡,以及跨国界民族的大量存在等;(2)可以将世界民族关系放置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具体场域中进行研究;(3)可以考虑类似“9·11”这样的突发事件对世界民族关系的影响;(4)可以从国家政治能力等不同角度综合分析各国民族整合的前景。只要借鉴以上建议,世界民族关系的七个趋势就会变得相对明了。当然,世界民族关系还会有其他趋势,只要论据充分、逻辑合理,趋势预测之间一般不会彼此抵牾。七个趋势能够为世界民族关系的趋势研究提供一种大体框架,如何在此基础上不断细化、深化,将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 [1] Athan Theoharis. *These Yet To Be United States: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in America since 1945*. Australi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2003.
- [2] 刘稚. 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J]. 云南社会科学 2004(5).
- [3] 汪信砚.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关于如何走出当代全球

化困境问题的思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4]陈衍德, 彭慧, 高金明, 王黎明.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5]U. 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EB/OL]. [2011-09-28]美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pop-ac.html>.

[6][美]杰里米·里夫金. 欧洲梦[M]. 杨治宜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7]Richard Bernstein. An Aging Europe May Find Itself on the

Sideline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03.

[8]李静. 民族交往心理构成要素的心理学分析[J]. 民族研究, 2007(6).

[9]Martin N. Marger.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9th Edition).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2011.

[10]周平. 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J]. 政治学研究, 2005(2).

收稿日期: 2012-10-03 责任编辑 孙国英

康熙朱批奏折量词掘例

管锡华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5月版)在量词用法方面很有特色,今举其中几个,以见一斑。

1、匹头

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初八日赵弘燮奏折:

本部选拔直隶马骡二千匹头,已于本年二月十八、三月初三等日面交解马道员李育德、知府刘民瞻讫。(《汇编》第6册第888页)

按“马”用“匹”、“骡”用“头”,“马骡”“匹头”是为合称。为何如此合称,五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赵弘燮奏折已经提供了信息“所有直隶现存马骡二千匹,臣请作为骆驼壹千只,可以少助运米之用。但直属地方非产驼之所,直属官员亦无善于采买吊到之人,请将此一千只骆驼每只折银八十两,共折银捌万两解交户部收贮”(《汇编》第6册第916页)乃马骡价值相等,每只四十两,故合称。

2、顶身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初三日佟国勳奏折:

奴才抵任,渐次将标下花铁盔甲、棉甲捐造修理共九百六十四顶身,账房二百顶,并旗帜器械,发中军游击刘世纲查验给伍。(《汇编》第6册第804页)

按“盔”用“顶”、“甲”用“身”,“顶身”是为合称。其因当是“盔甲”多合一为词,盔护头,甲护身,常是配套,再加上佟国勳所呈奏捐造修理者为数量多少,故而“顶身”合称。

3、封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马进良奏折:

谨选得藏香捌束、藏枣四封、藏杏四封、延寿果四封,专差家人刘祚印诣阙贡进。(《汇编》第6册第788页)

按“封”作为量词多用于书信函件之类,而用于枣杏果实属少见。这类枣杏果既不用斤而其小又难以计数,故用物包封进程,用“封”宜然。

4、把、束

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陈元龙奏折:

兹于十一月初三日臣家人回署,捧到御批奏折,并贡到恩赐鹿肉条三十把。(《汇编》第6册第615页)

康熙五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刘殿衡奏折:

蒙皇上特赐《御纂周易折中》一部,鹿肉条三十束,于十月十六日贡到楚省。(《汇编》第6册第567页)

按:一般解释是“把”多用于一手握持的数量,“束”多用于计量捆在一起的东西。但在康熙朱批奏折之中,“束”“把”是同义同用量词。但使用的次数还是有些不同,如《汇编》第6册康熙赐臣鹿肉条为例,用“把”5次,用“束”2次;《汇编》第8册用“把”2次,用“束”1次。但是二者并不见有用于一手握持的数量与用于计量捆在一起的东西的差别。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教古字[2006]191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管锡华,男,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